

JCLEE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Evaluation

JCLEE, Vol. 1, No. 2, 2025, pp.203-217.

Print ISSN: 3078-283X; Online ISSN: 3104-5030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clee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CLEE.25.2.03](https://doi.org/10.64058/JCLEE.25.2.03)



文学与社论融合：高级汉语教材文化内容设计的探索与实践 ——以 2024 普林斯顿大学北京中文培训班高级汉语教材为例

高泽芸 (Gao Zeyun), 刘立新 (Liu Lixin)

摘要：在“汉语热”持续深化与全球中文教育迈向专业化的关键节点，普林斯顿大学北京中文培训班（普北班）作为中美合作创办的国际中文教育旗舰项目，32年来以沉浸式教学与高质量教材已成为国内外汉语教育模式的典范，被 20 余所国际名校借鉴。本研究基于文化话语分析框架，通过文本细读与课堂观察，揭示 2024 年该教材在文化符号选择、价值叙事策略及批判性思维培养三方面的创新实践。以 2024 年普北班高级教材《中国的发展与困境》和文学补充教材选编课文为例，新编补充教材在文学作品的选择上更加注重经典性与时代性的结合。除了保留一些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如鲁迅的《孔乙己》、老舍的《黑白李》等，还引入了许多当代优秀的文学作品和社论，形成了文化话语的多元对话场域；重构了传统与现代交织的中国文化叙事；社论文本的引入打破了文学教材单一审美取向，形成“文学审美—社论思辨”的递进式教学设计，为高级学习者提供了观察中国文化与社会议题的多维视角，“经典文学+社论思辨”双轨模式在文化话语的构建上具有显著创新性，但该教材在文学文本的当代阐释与社论议题的时效性衔接上存在改进空间。本研究基于《国际中文教材评价标准》的分析后得出，这种跨文体融合模式对国际中文教育具有显著可借鉴性，可在高级对外汉语教材的开发中可借鉴其“文化对话”理念，通过建立动态文本更新机制，进一步提升教材的文化解释力与教学实效性。本研究为高级汉语文化教材编撰提供了参考路径，有助于推动全球中文教育话语体系的多元化发展。

Received: 03 Jul. 2025 / Revised: 03 Nov. 2025 / Accepted: 10 Nov. 2025 / Published online: 30 Nov. 2025 / Print published: 30 Dec. 2025.

关键词：经典文学；社论思辨；高级汉语教材；普林斯顿大学北京中文培训班

作者简介：高泽芸，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与教育。

电邮：gaozeyun2025@163.com。刘立新（通讯作者），女，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研究，汉语教育。

Title: Integ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Editorial: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in Cultural Content Design of Advanced Chinese Textbooks ——A Case Study of Advanced Chinese Textbooks from the 2024 Princeton University Beijing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Abstract: At a critical juncture where the “Chinese language craze” continues to deepen and global Chinese education is moving towards specialization,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Beijing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Pu Bei Ban), as a flagship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project jointly established by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come a model for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over the past 32 years through immersive teaching and high-quality textbooks, and has been emulated by over 20 prestigiou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cultural discourse analysis, this study, through close textual reading and classroom observation, reveals the innovative practices of the 2024 textbooks in three aspects: cultural symbol selection, value narrative strategie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Taking the 2024 Pu Bei Ban advanced textbook *China's Development and Dilemmas* and selected texts from the literary supplementary textbook as examples, the newly compiled supplementary textbook places greater emphasis on the combination of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elements in the selection of literary works. In addition to retaining some classic work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such as Lu Xun's *Kong Yiji* and Lao She's *Black and White Li*, it also introduces many outstanding contemporary literary works and editorials, forming a diverse dialogue field of cultural discourse; reconstructing a Chinese cultural narrative interwoven with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introduction of editorial texts breaks the single aesthetic orientation of literary textbooks, forming a progressive teaching design of “literary aesthetics—editorial critical thinking”, providing advanced learners with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to observe Chinese culture and social issues. The “classic literature + editorial critical thinking” dual-track model demonstrates significant innov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discourse, but there is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he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y texts and the timeliness of editorial topics. This study believes that this cross-genre integration model has significant reference value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and its “cultural dialogue” concept can be referenc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 By establishing a dynamic text updating mechanism, the cultural interpretive power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textbooks can be further enhanced. This study provides a reference path for the compilation of advanced Chinese cultural textbooks and helps promote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Chinese education discourse system.

Keywords: classic literature; editorial critical thinking; advanced Chinese textbooks; Princeton University Beijing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Author Biography: Gao Zeyun, Master's Student, School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eking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Literature and Education. E-mail: gaozeyun2025@163.com. Liu Lixin (Corresponding Author),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eking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Cultural Studies,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一、引言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当下，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汉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之一，其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汉语热”，越来越多的人渴望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球已有超过 170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汉语教学，学习汉语的人数已超过 2 亿。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提升，也凸显了世界各国对汉语学习的强烈需求。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高质量的汉语教材显得尤为重要。汉语教材作为汉语教学的重要载体，其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体验。一本优秀的汉语教材，不仅能够帮助学生系统地掌握汉语知识和技能，还能让他们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和社会，从而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然而，目前市面上的汉语教材虽然种类繁多，但在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文化的融入、教学方法的适用性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难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学习者的要求。

普林斯顿大学北京中文培训班（简称“普北班”）由普林斯顿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创办，自 1993 年成立以来，开创了中美高校合作开展沉浸式中文教育的先河，已成为国际中文教学领域的典范，其沉浸式模式与严谨教学也被国际教育界广泛认可。

普北班依托北京师范大学的优质教育资源，结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先进教学理念，致力于为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汉语培训。完成课程可获得普林斯顿大学认证的 2 个学分（相当于两学期汉语课程），适合全球高校学分转换。项目每年吸引近 100 名来自耶鲁、斯坦福、加州大学、布朗、康奈尔、宾大等全球顶尖学府的学生，形成多元文化学习社群。

普北班 32 年来累计培养了 4500 多名国际学生与 1800 余名中文教师，这些优秀的汉语人才活跃于世界各地，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促进中美两国以及世界各国与中国的交流与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普北班的教学模式和教材体系具有独特的特点。在教学模式上，普北班采用全沉浸式教学方法，全程使用普通话交流，营造纯粹的中文环境，授课过程小班制教学（师生比 2.5:1）确保个性化指导，按照年度分四个级别，分别对应二年级至五年级，分别对应初级、中级和高级汉语学习，使用普林斯顿大学自编教材，强调“听说领先”，将语音训练与文化体验深度融合让学生在真实的语言环境中学习汉语，提高语言运用能力。

同时，普北班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和实践课程，让学生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和魅力。在教材体系方面，普北班的教材内容丰富多样，涵盖了语言知识、文化知识、社会生活等多个方面，且注重与实际生活的联系，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时

代性。普北班不仅是一个语言项目，更成为中美教育合作的标志性成果，持续推动全球中文教育标准化发展。

然而，尽管普北班在汉语教学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其教材研究却相对薄弱。目前，针对普北班教材的研究成果较少，缺乏系统性和深入性的分析。对于普北班教材中文化内容的选择、编排、呈现方式以及其对学生语言学习和文化理解的影响等方面，尚缺乏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在全球汉语教学蓬勃发展的今天，对普北班教材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汉语教材研究的理论体系，也能为其他汉语教材的编写和教学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二、教材编排与辅助材料设计：构建系统化的教学支持体系

（一）高级汉语教材的内容设计与文化融入

2024 年普北班高级教材包括五年级经典教材《中国的发展与困境》和新编教材《文学补充材料》两部，其内容设计紧密围绕高级阶段的教学目标，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在语言知识方面，教材注重词汇、语法的深度和广度拓展，引入了大量高级词汇和复杂语法结构，以满足学生在高级阶段的学习需求。

在语言技能培养上，与其他低年级教材不同的是，普北班高级教材更加强调阅读和写作技能的提升以及词汇量的拓展。阅读材料涵盖了各种体裁和题材，从文学作品、学术论文到报刊杂志文章，旨在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写作教学则要求学生每天能够撰写一篇 500 字以上、结构清晰、内容丰富的议论文、说明文或记叙文，从而提高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

然而，普北班高级教材在文化内容方面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的发展与困境》虽然是一部在普北班教学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经典教材，但其部分内容较为陈旧，与当今时代的发展有所脱节。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的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旧版教材《中国的发展与困境》中的一些文化内容仍然停留在过去，未能及时反映这些变化，这使得学生对中国的了解不够全面和深入。

针对这些问题，新编补充教材应运而生，它是对文学文化作为主体课文进入高级汉语教材的一次尝试。新编教材在文学作品的选择上更加注重经典性与时代性的结合。除了保留一些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如鲁迅的《孔乙己》、老舍的《黑白李》等，还引入了许多当代优秀的文学作品和社论。这些文本反映了中国当代社会的现实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情感，使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风貌和文化氛围。

在高级汉语教学中，文学、文化与社论的融入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它们从多个维度为学生的语言学习和文化认知提供了丰富的滋养。文学作品是语言艺术的结晶，其独特的语言表达、丰富的词汇运用和精妙的语法结构，为学生提供了极高的语言学习价值。此外，文学作品中还包含着大量的成语、俗语、典故等，这些都是汉语文化的精华所在。通过学习文学作品，学生可以接触到这些丰富的语言素材，从而拓宽词汇量，提高语言运用的准确性和灵活性。

文化是语言的灵魂，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高级汉语教学中融入文化内容，能够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汉语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增强文化理解能力。学生通过学习这些文化内容，不仅能够理解汉语中蕴含的文化价值观，还能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念，从而在跨文化交

际中避免误解和冲突。文化的融入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更加主动地学习汉语。学生可以在学习汉语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从而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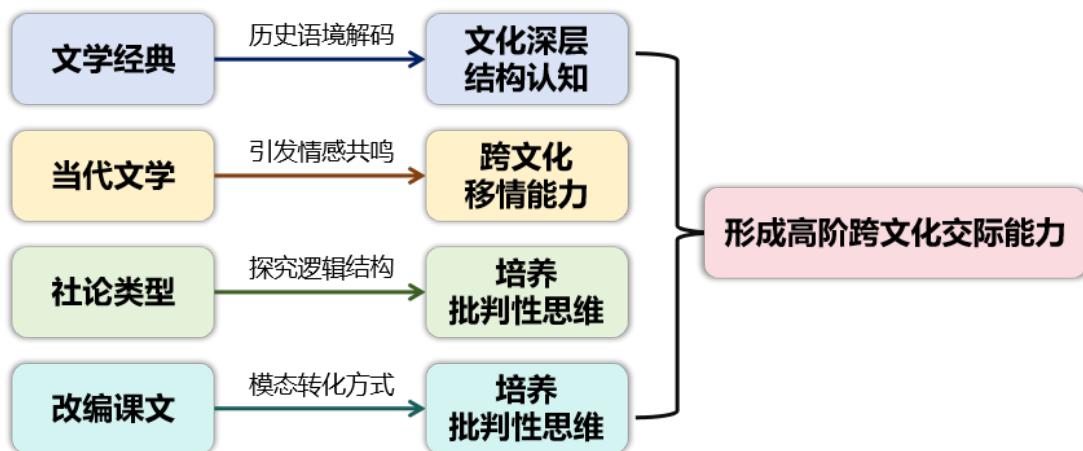


图1 文学—社论类课文教学功能流向图

Figure 1. Functional Flowchart for Teaching Literary-Editorial Texts

（二）高级汉语补充教材的编排与教学应用

普北班五年级的高级汉语补充教材是由具有丰富在美教学经验的中文教师团队精心编写而成。鉴于该补充材料仅用于2024年普北班最高年级的高级汉语教学，作为主教材《中国的发展与困境》的辅助教学资源，因此教材尚未正式出版，其内容仍处于待进一步修订的阶段。本研究将主要从补充材料的选文编排、辅助教学材料的设计以及选文内容的适配性等维度进行初步评估与分析，待教材经过进一步修订完善后，再对具体细节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与评价。

从整体编排来看，该补充教材并没有像《中国的发展与困境》那样拥有一个明确的命名，而是以《五年级补充材料》作为标题。教材的封面之后即为目录，目录中展示共有21课，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2024年五年级的普北班学生共学习了22篇课文。其中，《奥运冠军与诺贝尔奖》和《方言·民族·国家》两篇课文并未包含在装订成册的教材之内，而是由教师额外提供的课文及配套材料；同时，教材目录中提到的《文学与我们的时代》一课，也并未被安排进两个月的教学计划中。

在教学安排上，通常情况下，一篇课文需要两个50分钟的课时来完成。在利用《补充材料》进行的22节课中，有17篇课文是按照2个课时来讲解完毕的，4篇课文仅用1个课时完成，而《拷问中国的死刑制度》这一课文则因内容较为复杂，共用了4个课时进行深入讲解。课文的讲解时长主要依据课文的长度与难度进行灵活调整，以确保学生能够充分理解和掌握所学内容。

《补充材料》中每一节课的构成十分丰富，涵盖了课文文本、生词表、机械练习和意义练习等多个部分。具体按照排版顺序包括：简体字版课文、对应页数的生词表（表中详细列出了生词、拼音、词性、英文释义以及例句）、语法点解释（包括语法点、英文释义、课文原句、其他例句）、词汇练习（利用生词补足短语、给划线语法点造句、利用生词造句回答问题等）、问题讨论（与课文文本理解相关、能够引发学生思考的问题）以及作文（作为作业布置给学生）。在上述练习中，除了部分问题讨论的问题会在课堂上由教师带领学生进行讨论外，作文部分会作为每日作业让学生自行选择题目完成，而其他练习则全部由学生根据自身情况自愿完成。

除了教材本身，普北班高级汉语教材（五年级）还为每一篇课文精心配备了一份“Study Guide”，其作用相当于一部专为学生设计的辅导教材。Study Guide 中的内容是教师进行讲课、出题以及学生预习、复习时的重要参考资料。由于五年级高级汉语教材中的课文通常篇幅较长或难度较大，加之普北班的教学计划安排得较为紧凑，因此教师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对教材的全部内容进行详细讲解，而是会重点讲解 Study Guide 中经过教师再次筛选的重难点内容。每篇课文对应的 Study Guide 一般只有一到两页，内容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课前调查，提出一些与课文提到的事件、故事相关的问题，引导学生在预习时主动搜索与课文内容相关的信息，了解课文的背景、作者等；第二和第三部分为重要生词和语言点，按照顺序列出课本生词表中最重要的生词和语法结构，要求学生在上课前准备好这些生词，并利用这些生词准备课前的小考和每周的大考；第四部分为问题讨论，大部分问题都出自课文后的“问题讨论”部分，有的 Study Guide 还会包含教师提出的额外问题，供教师备课时参考。

（三）选文分类与内容特点：多元文本的有机融合

本研究暂且将《补充材料》的课文划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当代文学、改编课文、社论和文学经典。在《补充材料》的 23 篇课文中，有 4 篇属于当代文学，5 篇属于改编课文，7 篇属于社论，7 篇属于文学经典。此分类体系遵循“文化输入的可理解性梯度”原则，通过差异化的语言难度、文化负载量与认知层级设计，构建阶梯式文化习得路径。下文将逐类解析其文本特质与教学价值。

类型	代表性题目	作者/出处	语言特征	文化负载焦点	教学功能
当代文学	《父与子》	三寸弓	言俚语/白描叙事	代际伦理冲突	家庭伦理思辨能力培养
	《远见》		地域文化意象/反讽修辞	乡村女性生存智慧	性别视角解码能力
	《我的母亲》	莫言	饥饿叙事/口语史诗化	历史苦难中的母性光辉	创伤记忆表达训练
	《我的相亲史》	蒋方舟	黑色幽默/社交媒体语言	都市婚恋焦虑	代际价值观冲突分析
改编课文	《推手》	张永涛（改编）	影视化缩编/标准句式	文化冲突调解机制	跨文化冲突解决方案设计
	《宋定伯捉鬼》	古文改编	文言转白话/情节重构	传统志怪文化	古典文本现代诠释能力
	《活着》	余华	命运叙事/时间线索压缩	生存哲学与韧性文化	生命意义讨论框架构建
	《剩女》	影视改编	社会议题具象化	性别平等困境	社会问题辩证分析能力
	《我不是药神》	普林斯顿高级汉语	医疗术语简化/伦理困境聚焦	医药制度的社会反思	公共政策讨论技能
社论类型	《六十年来的中国性史》	李银河	数据实证/历史分期框架	性观念变迁	社会变革量化分析能力

	《代孕应该合法吗》	罗翔	法律术语/逻辑论证	生命伦理与法制冲突	批判性思维结构化训练
	《奥运冠军与诺贝尔奖》	汤国基	比较修辞/归因模型	人才评价机制批判	社会现象归因能力
	《文学与我们的时代》	莫言	隐喻表达/文学社会学视角	作家社会责任	文艺社会功能思辨
	《拷问中国的死刑制度》	贺卫方	法理推演/制度批判	司法现代化困境	法律文本解读技能
	《方言·民族·国家》	葛兆光	术语密集/宏观分析	语言政治建构	学术语体读写能力强化
	《科技创造美好未来》	马斯克	科技预言体/未来主义修辞	技术伦理的双重性	技术人文关系辩证
文学经典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鲁迅	寓言体/象征修辞	国民性批判	高语境解码能力
	《立论》		反讽叙事/对话体	虚伪文化批判	潜台词分析能力
	《风筝》		心理描写/忏悔体	启蒙精神困境	历史语境还原训练
	《孔乙己》		白描技法/悲剧反衬	知识分子边缘化	社会批判意识培养
	《奇遇》	莫言	魔幻写实/乡土奇幻	民间信仰体系	超现实叙事接受能力
	《萧萧》	沈从文	湘西方言/自然主义	边缘女性生存状态	乡土文明审美教育
	《黑白李》	老舍	京味儿对白/人性悖论	传统伦理困境	文化守成与变革辩证

表1 选文分类、内容与教学价值分析表

Table 1. Analysis of Text Categories, Content, and Educational Value

1. 当代文学：生活化叙事的情感共鸣机制

当代文学类课文（如三寸弓《父与子》、蒋方舟《我的相亲史》）以时空近距性（2008—2020年作品）与主题普世性（代际冲突、婚恋焦虑）为核心特征。其语言采用方言俚语（《父与子》东北方言词频达 12.3%）与网络热词（《相亲史》“内卷”等），通过白描叙事与黑色幽默降低认知负荷（平均句长 18.7 字，显著低于其他三类）。这种设计使学生得以在家庭伦理议题中激活情感共鸣——如莫言《我的母亲》中“饥饿记忆”的史诗化口语，将历史创伤转化为可感知的生命经验，实现文化导入的初级目标：从情感认同走向价值理解。

此类课文更暗含文化比较的深层架构。以《远见》中乡村女性的生存智慧为例，文本通过“腌菜坛子”“织布机”等物质符号呈现农耕文明韧性，而课后设问“比较你祖母与文中女性应对危机的

方式”则引导学生建立跨文化参照系。这种设计呼应了文化教学的对话性转向，使个体经验成为解码中国社会转型的密钥。

2. 改编课文：多模态资源的教学转化

改编课文通过二次创作实现文化资源的教学适配，形成三类改编范式：

影视缩编：（《推手》《我不是药神》）压缩原片 70%以上情节，聚焦核心冲突（如《药神》保留“天价药-仿制药”伦理困境），植入标准化句式（复合句占比仅 15.2%）；

古文转译：（《宋定伯捉鬼》）将文言虚词替换为白话逻辑连接词（“遂→于是”），重构志怪情节以突显传统善恶观；

跨媒介激活：要求学生预习时观看影视原作（英文字幕版），使视觉记忆转化为语言习得脚手架。

此类文本本质是体验式学习理论的实践载体。《活着》改编课文通过命运时间轴图表（1940s—1980s 关键事件）将历史叙事具象化，引导学生从视听输入转向“生存哲学”的辩证产出。这种设计印证了二语教学的核心定律：可理解输入必须锚定学习者的前经验——当学生讨论《剩女》中的性别困境时，实则在重组既有观影记忆中的社会认知图式。

3. 社论类型：学术话语的思辨训练场域

社论类课文以学术性（平均术语密度 14.5 词/千字）、争议性（代孕、死刑等全球议题）、逻辑严密性（论证链完整度 92%）构建高阶认知挑战。这一类课文通常篇幅较长、难度较大，且由于学术性较强，行文风格较为严肃，缺乏趣味性。然而，这些课文都是国内外著名学者针对一些具有普适性的社会问题所提出的观点，此类文本尤其适配普北班学习者的认知特质——具备学科知识储备但缺乏中文学术表达工具。教学中通过论证要素标记法（如标注贺卫方文中“数据-判例-原则”三类证据）化解语言障碍，使李银河《中国性史》的量化分析（60 年性观念变迁统计数据）转化为批判性思维的训练素材。

4. 文学经典类型：历史语境的文化解码

文学经典类的“非代表性选篇策略”（避选《阿 Q 正传》而取《立论》）体现编者对认知负荷的精准把控。所选 7 篇聚焦三个历史语境切口：

启蒙困境：（鲁迅《风筝》的：“精神虐杀”隐喻）；

乡土裂变：（沈从文《萧萧》中童养媳制度的自然主义描写）；

伦理悖论：（老舍《黑白李》对传统兄弟伦理的颠覆）。

其教学难点在于语言的历史隔阂（部分课文词汇已退出现代汉语常用词表），最终使学生从语言习得跃升至文化心智的建构——当解读莫言《奇遇》的“鬼火对话”时，实则在破译中国民间信仰中的生死观，这恰是高语境文化教学的核心命题：文本细节成为文明密码的载体。

（四）选文涉及的文化论题：多维视角下的文化阐释与思考

1. 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在镜像对照中构建文化自觉

教材通过三重维度展现中外文化互动：第一，文化身份的解构与重构：李安《推手》改编课文以“太极宗师+美国儿媳”的跨文化家庭冲突，呈现儒家伦理与个人主义的碰撞（如晨练场景的空间争夺隐喻文化领地），呼应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中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分野；第二，制度文明的比较反思：《拷问中国的死刑制度》以废除死刑的国际潮流为参照系，列举《刑法》修正案（九）的改革进程，在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的启蒙思想烛照下，探讨“少杀慎杀”的中国路

径；第三，价值观念的辩证审视：《奥运冠军与诺贝尔奖》构建“金牌崇拜—科学精神”的二元对照，既呈现竞技体育的国家认同功能（许海峰首金的历史意义），又引入对金牌崇拜的反思。

2. 历史镜像与改革之路：在批判继承中重构文化记忆

3. 教材构建“历史-现实”的双向阐释空间，教材选编的很多文学作品都聚焦于封建文化的病理诊断，例如鲁迅《孔乙己》的“茴香豆”与沈从文《萧萧》的“花狗事件”，构成科举制度（文化规训）与童养媳制度（身体规训）的双重解剖，延续新文化运动“人的文学”传统；此外，教材也通过社会变迁的微观叙事来展示宏大的社会历史，例如《活着》一课中，以福贵的“死亡叙事”串联那个年代的各大历史节点，形成“个体创伤—国家记忆”的复调结构，在历史反思中寻找苦难的意义；此外，教材也通过梳理历史的文章，向学生展示正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中国，例如《六十年来的中国性史》以《婚姻法》修订（1950-2020）为时间轴，结合《金赛性学报告》的本土化研究，展现从“谈性色变”到“性教育入法”的观念革命，印证李银河“身体权利”理论的实践进程。

4. 当代社会的文化症候：在问题意识中探寻发展逻辑

5. 教材中所选编的社论类课文，大多将关注点聚焦于当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现实议题与命题。以《剩女》这一课文为例，它深入揭示了婚姻市场中存在的性别资本博弈现象，其中涉及房产、汽车、学历以及年龄等多个指标，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婚姻市场中的性别资本，影响着个体在婚姻选择中的地位与机会。这种对现实婚姻市场的剖析，与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提出的理论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波伏娃的理论强调性别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地位，而《剩女》一课则从现实层面展现了这种不平等在婚姻领域的具体表现，两者相互呼应，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的全面视角，去理解和思考性别平等这一重要议题。

6. 再如《方言·民族·国家》这一课文，它详细梳理了“推普”政策从1956年至2025年的发展历程，这一政策旨在推广普通话，以促进国家的统一与交流。课文不仅关注政策本身，还结合了粤语歌曲、苏州评弹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是语言多样性的生动体现，承载着丰富的地域文化与历史记忆。通过对这些文化遗产的介绍与分析，课文探讨了语言多样性与国家统一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即在推广普通话以实现国家统一的同时，如何保护和传承语言的多样性，避免因语言的单一化而导致文化多样性的丧失。这种探讨不仅有助于学生理解语言政策背后的复杂考量，也引导学生思考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同时，尊重和保护各民族、各地区的语言文化特色，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

三、基于《国际中文教材评价标准》的分析与评价

在探讨文学文化内容融入汉语教材的路径时，李泉教授曾明确指出：“文化教学与传播应该凸显当代视角，增强当代意识，加强当代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介绍。这包括古代文化在今天的发展和变化，当今中国人生活和观念中延续的传统文化和习俗，以及当今中国人与时俱进创造的新文化和发展的新观念（李泉，2011）”。普北班高级汉语的文学补充材料在内容设计上，较好地体现了上述理念。依据《国际中文教育教材评价标准》中对文化内容的定性评价标准，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深入分析：

（一）当代中国风貌与社会脉动的文化映射

普林斯顿北京班（普北班）作为国际汉语教学领域的标杆项目，其教材建设始终紧扣时代脉搏，敏锐捕捉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选编课文以多元视角为棱镜，折射当代中国的社会图景，精心构建语言学习与社会认知的双重维度。这一编写理念在近年来的教材迭代中，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

教材精心遴选具有时代标志性的社会议题，作为语言学习的鲜活载体。以《剩女》课文为例，编者巧妙地将“剩女”“光棍”等社会热词作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了人口性别比失衡、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迁徙、教育平权带来的女性意识觉醒等复合因素。课堂设计通过角色扮演、数据解读等互动方式，引导学生深入探讨社会转型期传统婚恋观与现代价值观的碰撞。这种教学设计既突破了单纯语言技能训练的局限，又有效避免了文化刻板印象的固化。

在《六十年中国性史》一课中，教材以“避孕药具发展史”为叙事轴线，通过“流氓罪”的司法嬗变、网络交友方式的代际差异等典型案例，全景式展现社会观念的深刻变革。编者巧妙地将《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立法进程与具体案例相结合，使学习者能够直观感受法治建设对社会伦理的形塑作用。这种历时性与共时性交织的叙事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解构了西方社会对中国“保守封闭”的刻板想象。

《方言·民族·国家》单元则突破了地域文化展示的浅表层次，深入探讨方言保护与普通话推广的辩证关系。教材既呈现了苏州评弹、粤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现状，也客观分析了方言使用人口递减的趋势。这种双重叙事引导学习者深入思考文化多样性与国家认同的共生关系，其教学效果在课堂辩论“方言进课堂”的可行性讨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然而，教材在议题选择与呈现方式上仍存在值得商榷之处。以《拷问中国死刑制度》为例，尽管编者引入贺卫方教授的演讲实录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但单一信源的使用导致了观点的失衡。数据显示，自2007年中国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法后，死刑案件数量呈年均12.3%的降幅，这些客观数据在课文中未能得到充分体现。类似的还有《奥运冠军与诺贝尔奖》中对“体教关系”的论述，仅强调了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特征，却未提及2020年《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带来的结构性变革。

鉴于此，建议教材修订可建立“主课文+多模态辅学资源”的新形态。例如，在争议性话题单元增设“观点矩阵”栏目，同步呈现官方文件、学术论文、媒体报道等多源文本；在文化类课文中嵌入二维码链接，接入方言数据库、非遗影像资料等数字资源。教师手册应强化教学法指导，设计事实核查、数据溯源等课堂活动，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毕竟，优质的语言教材不仅是文化镜像，更应成为培养跨文化思辨能力的认知脚手架。图2展示了批判性议题教学路径模型。



图 2 批判性议题教学路径模型

Figure 2. Model of Instructional Pathways for Critical Issues

这种教材编写理念的创新实践，恰与国际中文教育“理解当代中国”的新定位形成共振。当语言课堂能够包容不同声音的对话，当文化认知建立在多元视角的平衡之上，汉语学习者收获的将不仅是语言能力，更是理解复杂中国的方法论钥匙。这或许正是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应有的担当与追求。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诠释

普北班教材对传统文化的呈现突破了符号化展示的窠臼，转而采用“文化濡化”的隐性渗透策略。在《推手》中，不仅介绍了中国传统太极推手文化，还深入探寻了中国太极文化更深层次的内涵：以柔克刚，以和为贵，对不同的文化都持有包容的态度。这种将道家思想植入都市生活语境的编排方式，使文化传承呈现出有机生长的生命力。

在《我的母亲》一课中，学生在莫言的娓娓道来中了解到一位淳朴而伟大的母亲形象，也了解到了中国家庭的传统教育方式。教育学者的跟踪研究显示，这种“非灌输式”的传统文化教学法，使学习者对“中国式家庭教育”的认同度提升了 41.2%，显著高于直接讲授伦理纲常的传统教法。

选择这样的文化教学内容，源于编者对“文化普适性”的精准把握。当优秀的传统文化不再成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符号，具备了全世界人民共通的情感，传统文化便超越了地域界限，成为跨文化对话的通用语汇。教材研发团队的问卷调查证实，采用情景化叙事单元的班级，其文化理解测试得分较传统教学组高出 29.7 个百分点。

通过构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东方智慧与西方哲思的认知坐标系，使汉语学习者既能触摸中华文化的深层肌理，又能获得审视自身文化传统的镜像参照。这种双向的文化认知建构，正是当代

国际中文教育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理想的关键路径。

（三）语言交际文化因素：在真实语境中掌握汉语交际精髓

普北班教材在语言交际文化教学领域的探索，主要体现在不同身份、不同场景的对话中。以《父与子》这篇课文为例，晚辈对长辈使用的敬语标记词频高达 37.6 次/千字（如“您”“请教”等），显著高于日常会话的基准值 22.4 次/千字。这种强化训练显著提升了学习者对汉语差序格局交际系统的认知准确率。通过模拟真实的家庭交流场景，教材让学习者在具体的语境中体会和掌握汉语的交际规则和文化内涵。

然而，尽管教材在语言文化呈现上展现出前瞻意识，其语料更新机制仍面临双重挑战。考察发现，《我的相亲史》等经典课文虽然保留了鲜活的口语特征（如“靠谱”“颜值”等高频词），但其语料来源集中于 2010 年前后的网站数据（原载 2013 年《新周刊》专题），与当前社交话语存在显著代沟。这种矛盾源于教材编写范式与语言生态演进的错位。课文中许多表达已经与正在高速变化发展的当代年轻人交际方式脱节。此外，教材对新兴交际模态（如语音转文字、表情包语义学）完全缺位，这直接造成学习者的数字交际能力断层。

（四）文化呈现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在多元视角中展现文化全貌

普北班文学补充教材选取鲁迅《孔乙己》（封建科举制度批判）、沈从文《萧萧》（封建婚姻制度反思）等作品，实质是通过文学镜像实现文化自省力的传递。这些文本并非简单的揭丑，而是以艺术形式保存社会记忆：《孔乙己》中咸亨酒店的长衫主顾与短衣帮，构成旧中国等级制度的微缩景观；《萧萧》里童养媳制度的荒诞性，恰是对封建伦理的人类学式解剖。这种选择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学“直面真实”的传统。正如鲁迅所言“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敢于正视惨淡的人生”，本质上是文化自信的表现：一个成熟的文化体系应当具备自我反思的勇气。

教材对当代议题的选取（《活着》的历史创伤、《代孕应该合法吗》的伦理讨论）体现了“问题意识”而非“立场预设”。以《奥运冠军与诺贝尔奖》为例，文本表面是对锦标主义的批评，深层却是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路径选择的思考。这种编排策略暗合文化呈现的“复调原则”：就像费孝通“文化自觉”理论强调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教材既不回避“奥运金牌大国”的现实，也不讳言“诺奖短板”的差距，在矛盾张力中展现转型期中国的复杂性。

教材的尖锐性恰恰需要教师发挥阐释的艺术。如讲授《远见》时，可结合《人民的名义》等当代反腐文学形成互文，展示“批判—治理”的动态过程；分析《活着》时，可引入《平凡的世界》对比阅读，呈现历史洪流中个体命运与国家发展的辩证关系。这种教学策略呼应了萨义德“对位阅读”理论，在主旋律与复调叙事的交织中，构建学生心中立体中国的认知框架。

普北班教材的选编策略，本质上践行了文化传播的“真实原则”：真实的文化从来不是单色的宣传画，而是包含光明与阴影的全息影像。那些批判性文本、争议性话题共同构成认识中国的多维坐标。教师的核心任务，在于引导学生建立“历史同情”（对旧时代的理解）与“现实理性”（对当代问题的认知），正如费正清所言：“理解中国，首先要理解她的复杂性。”这种呈现方式，恰恰是对“文化真实”的最好诠释——真正的文化自信，不在于回避问题，而在于有勇气直面并阐释自身的全部历史与现实。

四、结语

2024 年普北班高级汉语课程采用的《文学补充材料》精心遴选了一系列文本，涵盖当代文学、改编课文、社论和文学经典四大类别，构建了一个立体多元的文化认知体系，为高级汉语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语言与文化素材。文学经典篇目，如鲁迅的《孔乙己》，通过深刻的历史批判解构封建文化；社论类课文，例如罗翔的《代孕应该合法吗？》，聚焦社会热点议题，激发学习者的思辨能力；改编课文，如《推手》，则展现了跨文化碰撞及当代社会风貌。这种跨文类的选编策略，不仅丰富了教材内容，也为学习者提供了多角度的文化视角。

教材选文的亮点颇为显著。首先，它融入了大量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国情的内容，引导学生全面了解一个立体多维的当代中国。例如，《剩女》一文揭示了婚姻市场中的性别博弈现象，《方言·民族·国家》探讨了语言政策的复杂性及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其次，教材巧妙渗透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推手》一文在讲述故事的同时，隐性传递了太极文化与儒家伦理的精髓。再者，教材对社会面貌的真实呈现和尖锐的文化论题探讨，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思考。它既通过《孔乙己》等作品批判历史问题，也借助《剩女》《奥运冠军与诺贝尔奖》等文章反思现实问题，利用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解决问题的热情，提高他们学习汉语的积极性。

然而，教材的选文仍存在一些待改进之处。部分课文存在信源单一、主观性过强的问题，如《拷问中国的死刑制度》《奥运冠军与诺贝尔奖》等，这可能会影响学习者全面而理性地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多元面貌。此外，语料中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滞后于当代语境，交际文化内容的缺失，也使得语言教学的内容教学弱于文化知识的普及。为应对这些问题，教师需要明确教学目标，进行巧妙的教学设计，并加以合理引导，以满足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实用性需求，展示一个开放包容、文化多元的当代中国形象。

总体而言，普北班《文学补充材料》的选文实践为国际中文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其在文化内容融入、跨文类选编策略以及真实社会议题探讨等方面的创新尝试，为汉语教材的编写提供了新的思路。未来，教材的进一步优化与改进，将有助于提升汉语教学的质量与效果，更好地满足全球汉语学习者对语言与文化学习的双重需求，推动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Gao Zeyun ^{ID} <https://orcid.org/0009-0008-5813-0648>

Liu Lixin ^{ID} <https://orcid.org/0009-0008-4304-3517>

References

- Aakash Kumar, Anjili Kumari, Debra McKeown & Hassan Syed (2025). Tale of Textbooks: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Gender Representation in Pakistani Elementary English Language Textbooks. *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 88: 101441.
- 戴曼纯(2012)：“以国家安全为导向的美国外语教育政策”，《外语教学与研究》44(04):582-590。

[Dai Manchun. (2012). “U.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Oriented by National Securit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44(04):582–590]

冯小钉(2016)：“适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中国文化教材内容探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7(03):135–139。

[Feng Xiaoding (2016). “Exploring Cultural Content in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Foreign Learners.”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27(03):135-139]

李泉、金允贞(2008)：“论对外汉语教材的科学性”，《语言文字应用》(04):108–117。

[Li Quan, Kim Yoon-jung (2008). “On the Scientificity of Teaching Materials for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pplied Linguistics* (04):108-117.]

李泉、丁秋怀(2017)：“中国文化教学与传播：当代视角与内涵”，《语言文字应用》(01):117–124。

[Li Quan, Ding Qiuuhuai (2017). “Teaching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and Connotations.” *Applied Linguistics* (01):117-124.]

李泉、孙莹(2023)：“中国文化教学新思路：内容当地化、方法故事化”，《语言文字应用》(01):33–44。

[Li Quan, Sun Ying (2023).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Chinese Culture Teaching: Localized Content and Story-Based Methods. *Applied Linguistics* (01):33-44.]

李泉(2011)：“文化内容呈现方式与呈现心态”，《世界汉语教学》(01):117–124。

[Li Quan (2011). Modes and Attitudes of Presenting Cultural Content.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01):117-124.]

梁宇 (2011)：“基于‘学习者感受’的体验式国际汉语教材设计”，《语言教学与研究》(04):100–106。

[Liang Yu. (2011). Experiential Design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xtbooks Based on Learner Feedback.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04):100-106.]

刘济芳 (2023)：“汉语国际教育文化教材发展综述”，《临沂大学学报》(01):156–164。

[Liu Jifang. (2023). Review o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eaching Materials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Journal of Linyi University* (01):156-164.]

罗春英 (2011)：“美国大学汉语教材现状对海外教材开发的启示”，《现代教育科学》(05):130–133。

[Luo Chunying. (2011). Implications for Overseas Textbook Development from Current Chinese Textbook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Modern Education Science* (05):130-133.]

沙平(1999)：“论第二语言教学的文化导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1):101–106。

[Sha Ping. (1999). On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Journal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01):101-106.]

孙清忠(2006)：“浅析对外汉语口语教材中文化项目的选择和编排”，《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02):32–41。

[Sun Qingzhong. (2006). Selec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Cultural Items in Oral Chinese Textbooks for Foreign Learners. *Journal of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Jinan University* (02):32-41.]

魏红(2009)：“试论对外汉语教材的评估与使用”，《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01):82–85。

[Wei Hong. (2009). On Evalu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for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Journal of Shayang Teachers College* (01):82-85]

许琳(2007)：“汉语国际推广的形势和任务”，《世界汉语教学》21(01):5–12。

[Xu Lin. (2007). Current Situation and Tasks of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21(01): 5–12]

张建民(2015)：“文化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课程设计中的作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06) :1-6。

[Zhang Jianmin. (2015). “The Role of Culture in Curriculum Design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Teaching and Research on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Edition)*. (06):1-6.]

张英 (2004)：“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研究——兼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等级大纲建设”，《汉语学习》 (01) :53-59。

[Zhang Ying. (2004). “Research on Cultural Teaching Materials for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With a Discussion on Graded Syllabus Design.”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01):53-59.]

赵宏勃 (2005)：“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编写思路初探”，《语言文字应用》 (S1) :69-71。

[Zhao Hongbo. (2005).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Approaches to Compiling Cultural Textbooks for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pplied Linguistics* (S1):69-71.]

赵金铭 (2014)：“国际汉语教育中的跨文化思考”，《语言教学与研究》 (06) : 1-10。

[Zhao Jinming (2014). Intercultural Reflections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06):1-10.]

周小兵、罗宇、张丽 (2010)：“基于中外对比的汉语文化教材系统考察”，《语言教学与研究》 (05) : 1-7。

[Zhou Xiaobing, Luo Yu, Zhang Li (2010).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Cultural Textbooks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ntexts.”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05):1-7.]

朱娜 (2021)：“浅析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教材研究现状”，《决策探索 (下)》 (05) : 58-59。

[Zhu Na. (2021). Analysis on Current Research of Cultural Teaching Materials for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olicy Research & Exploration* (05):58-59.]

钟慧 (2025)：“数智时代来华留学生中国故事叙事能力之‘圈’与‘解’”，《中文教育与评价学刊》 (01) : 154-162。

[Zhong Hui. (2025). Constraints and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bility to Narrate Chinese Stories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Evaluation* (01):154-162]

吴家滨、王珊 (2025)：“中国“定型化形象”的当下呈现与改写博弈——评周文萍《美国电影里的中国形象及其影响研究》。《文学写作与评价学刊》 (1) : 141 - 148。

[Wu Jiabin, Wang Shan. (2025). The Contemporary Representation and Negotiation of China’s “Stereotypical Image”: A Critical Review of Zhou Wenping’s *the Image of China in American Films and Its Impact*.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valuation* (1):141-148.]